

试论顾炎武的豪杰人格

陈友乔

(惠州学院 政法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07)

摘要: 明清之际,豪杰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类型。顾炎武以豪杰自期期人,是豪杰谱系上重要的一环。顾炎武的豪杰人格以“明道救世”为旨归,其人格结构以原始儒学为底色,以市民意识为新质。无论是在为人还是在为学上,顾炎武都表现出独立不倚的姿态,多是针对陆王一系的矫枉过正之举。顾炎武有着殷殷的救世情怀,他以口中之舌、手中之笔向当政布露民瘼。为从根本上扭转王学之颓风,顾炎武不仅显示出了摧陷廓清的本领,而且表现出导夫先路的魄力。在交接上,顾炎武坚持守经与用权的统一,为遗民事业开拓了新境界。

关键词: 顾炎武; 豪杰人格; 独立不倚; 救世情怀; 开山气魄; 守经达权

中图分类号: B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7)02-0012-08

顾炎武是与黄宗羲、王夫之鼎足而立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一生为学,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成为引领学术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先导大师。顾炎武的历史贡献与地位,正与其豪杰人格相表里。钱穆先生明晰地揭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凡所云云,开其为此,而戒其为彼。其气厉,其指晰。而其治学所探之方法,尤足为后人开无穷之门径。故并世学者如梨洲,如夏峰,如习斋,如蒿菴,声气光烈,皆不足相肩,而卒为乾嘉以下考据学派所群归仰纵。其议论意见未必尽是,或不免于甚误,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1](P146)}

顾炎武的豪杰人格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清之际,“自由之研究思想特盛”^{[2](P25)},“所普遍呼唤的,是经纬天地、建功立业的英雄和豪杰”^{[3](P56)},涌现出了孙奇逢、刘宗周、顾炎武、黄羲之、王夫之、颜元等豪杰之士。这些豪杰之士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无所依傍的品格”;二是“面向现实、经纬天

地,在历史过程中建功立业”^{[4](P47)}。豪杰精神的勃兴^{[3](P54-63); [5](P84-106); [6](P76-82); [7](P98-106)},是对晚明政治腐败、学术荒陋的反拨。对豪杰的期许蔚为时代潮流。黄宗羲呼唤“经天纬地”的豪杰;王夫之“将‘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融入到圣贤气象之中,从而塑造了豪杰和圣贤为一体的理想人格”^{[8](P3)};颜元在其事功之学的基础上提出融德、智、勇为一体的豪杰型人格,“‘三达德’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大而谋王定国,小而庄农商贾,都缺他不得”^{[9](P302)}。在这一谱系的参照下,顾炎武的豪杰人格也有其特色^①:一是对于豪杰的界定以“明道救世”为准的,虽重实行践履,但不似颜元“各专一事,未尝兼摄,亦便是豪杰”^{[9](P677)}的宽泛而流于实务家;二是他的独立不倚,虽然形式上呈出自自我发越与恢张的姿态,但多是针对陆王一系任心废事、放诞无忌的矫枉过正之举;三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其豪杰人格的伦理基础,其遗民活动、学术活动均依

收稿日期:2016-12-2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广东进士群体研究”(2016zx001)。

作者简介:陈友乔(1974-),男,湖北仙桃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①顾炎武基于将政治得失归结于学术纯驳的思路,返之六经,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命题,是一种形式上的复归,因之,顾炎武人格给人一种浓重的复古色彩;加之,其所生活的时代、地域,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发展,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市民意识的烙印。“以自私自利为本质特征的市民意识作为顾炎武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内在包含追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这一几乎贯彻于其人生过程之始终的人文精神,在其人生经历中具体而现实性的表现,就是他通过自己的治生活动来谋求其独立自主的生活。”(参见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此展开;四是人格结构以原始儒学为底色,以市民意识为新质。

关于顾炎武豪杰人格问题的研究,已有的成果不多^{[10] (P422-441); [11] (P127-136)} 其中大多数是就明清之际士人群体人格时有所论及。虽有学者集中论述,但不够深入。许苏民先生从思想研究的角度出发抉发出顾炎武关于豪杰精神的思想:顾炎武所提倡的豪杰精神“近乎墨侠”^{[10] (P425)} 并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操,是其所倡导的豪杰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10] (P434)}。顾炎武关于豪杰精神的思想固然构成其豪杰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忽略了他一生丰富的社会实践。基于这种视角的研究,既失之精准,又不够生动。简略说来,人格是个体的心理、行为等方面特征的总和。因此,对顾炎武豪杰人格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文本,还要着眼于行为。何以如此?对于顾炎武这样注重实行践履的学者而言,其人格“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日常生活,又存在于文学作品,可表述为‘行为式存在’和‘文本式存在’”^{[12] (P99)}。本文拟从顾炎武的行为方式、社会实践、学术思想等维度展开,努力将其豪杰人格的丰富面相呈现出来,以期对顾炎武相关研究领域有所推进。

一 独立不倚的个性锋芒

大凡豪杰之士,均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惟其自信,故能道德挺立,无所依傍,独行其是,不顾世俗之毁誉。“其豪杰性之行为与精神,则自始即是自作主宰。”^{[13] (P16)} 顾炎武反抗潮流,百折不回,决不揣摩风气、悦世取容,表现出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无论是为人、为学,均是如此。对此,顾炎武极为自信“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14] (P94)} “出游一纪,一生气骨幸未至潦倒随人。”^{[14] (P205)}

在为人方面,顾炎武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古来豪杰,多头角峥嵘之士。其一言一行,光焰逼人,自有别于凡民,表现出“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狂者胸次。“而狂狷则必行心之所真是,决不陪奉,此便是豪杰精神。”^{[13] (P17)} 顾炎武有着不同于庸众的狂狷介之性,“惟梨洲近于狂,而亭林近于狷”^{[1] (P152)}。

顾炎武少有异行,显示出其孑然独立之姿。“少落落有大志,不与人苟同,耿介绝俗,其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异之。最与里中归庄相善,共游复社,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15] (P113)} 顾炎武虽出生于

江南,但他钟情于北方:在生活习惯方面,他“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16] (P132)};在人生安顿方面,他将此作为其遗民、学术活动的根据地,客居25年而终老于斯。此等骇怪之举,在明清之际的遗民群里很难找出第二人。梁启超曾慨叹“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17] (P50)}

顾炎武走出去问学,真正做到了“行千里路,破万卷书”。“而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14] (P140)} 这是让同时代学者瞠乎其后的地方。“盖梨洲自中年以后,蠖居浙东,轻易不渡钱塘。”^{[1] (P152)} “船山平生踪迹所及,止于湘桂之间。其师友往还极少,声光甚黯。”^{[1] (P116)} “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14] (P140)} 的经历,赋予顾炎武纵论天下、擘画经营的豪情与魄力。“然华阴缩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14] (P87)}

顾炎武善于治生,这在“士人的贫困化,是明清之际有普遍性的事实”^{[18] (P281)} 的背景下,更见其卓尔不凡。他切实笃行,善做实事,努力摘除“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帽子。北游期间,顾炎武进行过农业垦殖和高利贷经营^{[19] (P210-212)}。他曾邀约“同事者二十余人,辟草莱,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并信心满怀地宣称“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蓄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14] (P140-141)} 对于顾炎武的这段传奇经历,全祖望推崇备至,赞曰“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随寓即饶足。”^{[20] (P117)}

顾炎武耿介自守,不肯与世沉浮、与俗合流。如其所谓“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21] (P779)} 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是顾炎武的外甥,后来三人位居大学士、尚书高位,是当时响当当的闻人名士。顾炎武因黄培诗案身陷囹圄,几遭不测,在包括徐元文在内的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得以了结^{[22] (P363-378); [10] (P140-146); [23] (P102-115)}。后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潘耒也受聘参与其事,遭到顾炎武的极力反对。他告诫弟子,徐乾学此举,不过是“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他还以亲身经历让其认清权贵的本来面目“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14] (P167)} 在常人看来,顾炎武似乎太

过古板刻薄,不近人情。然而,这正是顾炎武人格整峻处,与呼朋引类之流何啻霄壤!

在为学方面,顾炎武主张人格挺立,反对曲学阿世。晚明之时,世风颓坏,追名逐利之风盛行。“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21] [P415]}流风所及,以至于“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21] [P767]}。为此,顾炎武呼唤豪杰精神“当此世道横流之日,不有一二君子,何以挽颓风而存绝学?”^{[14] [P211]}

晚明学者醉心于讲学,对于国计民生、百姓痛痒漠然置之,一以讲学之为事。为此,顾炎武怒斥讲学之风,以其锸然之锋,抗击流俗。“然不坐讲堂,不收门徒,欲尽反正德以来诸老先生之风习。”^{[14] [P168]}他明确表示,决不“自贬其学”而“枉道从人”：“‘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若狗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则是枉道以从人,而我亦将有所不暇。”^{[14] [P47]}

顾炎武深感著书之难,主张“以临终绝笔为定”,反对急于成书的求名之举。他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21] [P1084]}顾炎武努力祛除躁进之心,十年磨一剑,期成不朽之作。正如他在给弟子潘耒的信中说“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札来索此,原一亦索此书并欲钞《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今夏可印,其全书再待一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14] [P77]}

二 救焚拯溺的济世情怀

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认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之秋,自己不能报效国家,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只会坐在屋子里摇笔杆子,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是志在四方的男子汉的奇耻大辱。”^{[24] [P79-80]}顾炎武有着殷殷的救世情怀,并视其为儒者的天职。他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其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14] [P48-49]}

豪杰人格的生成,有赖于人生忧患的助力。顾炎武以富室子弟而饱经忧患。除了鼎革巨变之外,他还经历了家难、陆恩案、黄培诗案等几次大的祸患^{[25] [P87-88]}。这些祸患磨砺了顾炎武的处事应变能力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黄培诗案了结之后,好友

归庄称扬其“善处忧患”与“精于脱祸”^{[26] [P323]};他还指出,忧患成就了顾炎武的豪杰人生“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26] [P339]}

甲申之变,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崇祯之死,激发了士人的忠义之气。“明清之际的大量的死,仍不妨认为由崇祯之死为揭幕。崇祯之死,即使不是此后一系列的死的直接诱因,也是其鼓舞,是道义的启导、激发,是示范、垂训,是人主施之于臣子的最后命令。”^{[18] [P20-21]}面对这一天崩地坼的巨变,顾炎武表达对故国旧君的哀思。其诗曰“小臣王室泪,无路哭桥陵。”^{[14] [P259]}一如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顾炎武蒿目时艰,积极投身于抗清事业。

弘光政权建立后,授予兵部司务的顾炎武振奋不已。他希望收复河山,一雪国耻。“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仇”^{[14] [P260]}。在赴阙就职前,顾炎武作“乙酉四论”,为匡复大计建言献策。南都沦陷后,顾炎武先后参加了苏州、昆山保卫战。他以史诗般的手笔描绘了同仇敌忾的战争场景“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14] [P265]}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江南保卫战中,清军的野蛮屠戮,更激发了顾炎武的抗清斗志。他以沉郁悲怆之笔记录了惨烈的战事和深沉的家国之痛,其诗曰“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残。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又诗曰“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归元贤大夫,断脰良家子。”^{[14] [P265-266]}

此后,顾炎武遥奉隆武政权,辗转于太湖流域,开展抗清斗争。“春风一夕动三山,使者持旌出汉关。万里干戈传御札,十行书字识天颜。身留绝塞援袍伍,梦在行朝执戟班。一听纶言同感激,收京遥待翠华还。”^{[14] [P268]}随着抗清形势渐趋消沉,抗清志士风流云散,龙虎失据,顾炎武以精卫自喻,表达了矢志抗清的决心。他以诗言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14] [P279]}

北游之后,顾炎武“由原来比较积极地或明或暗参与南明抗清战争,逐渐转换成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了”^{[27] [P145]}。他关注的目标开始脱离君国范围而系心于天下,逐渐从政治遗民转换为文化遗民^{[28] [P312-318]}。转化为文化遗民之后,顾炎武萦心于吏治臧否、民生痛苦和社会疾患。他虽无官守、无言责,但他以手中之笔、口中之舌向当政建言献策,或著书立说,“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14] [P27]}。

顾炎武针对社会疾患的症候,号脉司药。清初

的赋税制度基本上是承明之旧,“漕粮省份,有本色、折色之分。折色征银,本色征米。无漕粮处,一概征银”^{[29] [P611]}。有见于“以银为赋”中的“病民”“病国”之举,顾炎武主张取消征银,视具体情况或征其本色,或以钱为赋。

一是银荒病民。在征银制度下,百姓必须以所产的稻菽桑麻之属换取非所产之银。由于“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21] [P655]},出现了“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的现象。究其原因,“则有谷而无银也”^{[14] [P17]}。为解决此问题,顾炎武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措施“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14] [P18]}

二是火耗病民。银有自然的损耗,加之解运过程中的各种损耗,官府“于正数外有加者,名曰‘火耗’”^{[30] [P200]}。顾炎武指出,在火耗制度下,官吏层层盘剥,老百姓不堪重负。“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14] [P19]}官吏与豪绅大户勾结,上下其手,转移税负,穷苦小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七八矣。”^{[14] [P19]}由于各级官吏群马分肥,使得这一制度牢不可破。“解之藩司,谓之羨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者矣。”^{[14] [P19]}为此,顾炎武建议征其本色,在不可得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征钱。征粟米,虽不免有巧取于民之举,但“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至于征钱,则可杜绝火耗之名目,“钱则无火耗之加”^{[14] [P20]}。

顾炎武的殷殷救世之情老而弥笃。康熙十九年(1680),即去世前2年,顾炎武向时任《明史》监修总裁的外甥徐元文告知民生疾苦之状“关辅荒凉,

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鸟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旗抗令。”“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为此,顾炎武希望“身当史局”的外甥徐元文“因事纳规”,使“庙堂之上”深悉“此一方之隐忧”^{[14] [P138-139]}。

三 振衰起敝的开山气魄

在学术文化领域,能以绝大的气魄振衰起敝,存亡续绝,非豪杰莫为。“学术文化之风气已弊,而积重难返,独排当时之所宗尚,以涤荡一世之心胸,是豪杰之精神。”^{[13] [P17]}中晚明之后,针对王学的虚无主义和空谈之风等流弊,尤其是泰州学派的狂禅化倾向,学者们既对王学进行反思与批判,又大力倡导实学。在这一“崇实黜虚”“由虚返实”的时代大潮中,顾炎武有别于同时代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对于王学的清算,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正如梁启超所说“要之清初大师,如夏峰、梨洲、二曲辈,纯为明学余波。如船山、舜水辈虽有反明学的倾向,而未有新建设,或所建设未能影响社会。亭林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17] [P52]}

顾炎武严厉指斥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最后导致社稷沦亡、家国无存的可耻可悲结局。“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21] [P402]}顾炎武追溯了清谈的历史,并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心学创立者王阳明。“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21] [P1068]}尽管视清谈、明心见性为明亡的根本原因,不无可议之处^①。但是,在顾炎武看来,作

^①周绍贤指出“清谈之实际,除做理论值解辩而外,犹如吟诗结社,有以文会友之乐,无妨于所任之本职。而世之论者,谓名士放废世事,甚至谓清谈误国,可谓‘羌无故实’之论。”(转引自孙述圻《六朝思想史》,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杨国荣指出“将明亡的根源归结为明心见性的内圣趋向,当然并未触及问题的真正症结。”(杨国荣《明清之际价值观的转换》,《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

为四民之首,士大夫对于这种蠹政害民的社会风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①。循此思路,顾炎武抨击王学最为斩截风劲,不容置辩。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明清之际对王学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学者当中,“言论最激烈,态度最严正,影响最深远者,厥为顾炎武也。”^{[31][P100]}

顾炎武痛斥王学末流闭目塞听、绝物忘智的澄心静修,以及直心任性、毁弃礼法的率性而为。顾炎武引《黄氏日钞》指出,心时刻运行不息,不是虚空静止的;心是身之主宰,以应物治事。因此,他反对冥心静坐的所谓格心、禁心、治心之举。他说“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摄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21][P31-32]}

如何从根本上扭转王学之颓风,顾炎武不仅表现出了摧陷廓清的本领,而且显示了导夫先路的魄力。“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重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17][P55]}

关于破旧之后如何立新,顾炎武明确地主张回归经学传统,以济理学之穷。他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14][P58]}学风之窳败,使得圣人立身处世、为学问道之精义茫然无存,进而导致士风与世风日渐颓坏。因此,顾炎武说“窃叹夫百馀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

言也。”^{[14][P40-41]}因此,欲彰明圣人之道,必须返之六经“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14][P135]}顾炎武认为,回归经学传统,不惟是救弊之策,更是务本之学。“至于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则为山覆篲,当加进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务本源之学。”^{[14][P90]}由于长期浸淫于“俗学”,经学已成绝学,以致不能通其句读,解其文义。于是,擅改经文之风盛行,从而使得经义更加隐晦难懂。“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14][P69]}顾炎武不是为通经而通经,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4][P98]}为此,他明确提出了“知音—考文—通经—明道—救世”的研究路径“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4][P73]}

在学术原则上,顾炎武强调重实证,善阙疑,贵创造。顾炎武在考据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学术成就,这在“重实证(据)毕竟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27][P254]}的明清之际,可谓得风气之先。为了保证史料真实性,顾炎武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考证,更重实地调查。全祖望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32][P231]}

在“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的时代,顾炎武正是以祛魅的精神开展学术研究。在音韵学研究中,顾炎武“大骇人听”地提出“孔子未免有误”^{[26][P324]}。作为一个终身服膺孔子的严谨学者,顾炎武坚持“阙疑”的态度,反对臆度的主观主义学风,显示了其难能可贵的科学理性^②。

顾炎武提倡创造新知,反对蹈袭前人,陈陈相

^①顾炎武强调,士君子对于社会风气的纯驳,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他引罗仲素之言“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顾炎武《日知录》卷13“廉耻”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73页)他还引范晔之言“论东汉士风”时说“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顾炎武《日知录》卷13“两汉风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53页)

^②据周可真考证,顾炎武是继李贽之后直接而公开地表示不必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学者。(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因。“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21][P1097]}不摆脱依傍行迹,断难出前人矩矱,“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14][P95-96]}。《日知录》成书后,顾炎武为了保持其原创性,屡屡勘改。他在序中说“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他还严厉斥责那些公然剽窃的“钝贼”:“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21][P1073]}

四 守经达权的遗民立场

经与权是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33][P989]}儒家经权思想的奥义在于,既要遵守道德原则,又要把握灵活性。“‘经’与‘权’是孔学一大问题,我以为译为原则性与灵活性最贴切。”^{[34][P172]}顾炎武继承了儒家的经权思想。一方面强调守经,即君臣、父子、夫妻的人伦关系是必须遵从的常道。“然则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者也。”^{[21][P378]}另一方面强调用权,反对缺乏变通的“执一不化”与“胶于一”。“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扞格而不通。”^{[21][P30]}“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14][P82]}易代之际,顾炎武守经达权,一方面,坚守“无仕二姓”的亡母遗命,决不为清廷效力;另一方面,走出狭隘的方寸之地,广泛地结交遗民以及清廷官吏,成就了其“阔大的学术以至人生境界”^{[17][P355]}。

统治局面稍稍稳定后,清廷为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先后以编修《明史》、开博学鸿词科等名目网罗胜国遗逸,为新朝汲引人才。顾炎武、黄宗羲、李颀、傅山等遗民大佬饱受羁縻之苦。顾炎武始终牢记“无为异国臣子”^{[14][P165]}的亡母遗言,以此作为一条道德铁律,不惜以死抗争。

康熙十年(1671)夏,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宴请顾炎武、徐乾学舅甥。熊赐履席间表示有意请顾

炎武佐修《明史》,遭到顾炎武的峻拒“余答以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以至熊、徐“两人皆愕然”。2年后,顾炎武向徐乾学问及熊赐履修《明史》事,答以“熊老师自闻母舅之言,绝不提起此事矣”^{[14][P196]}。

康熙十七年(1678),顾炎武又有“鸿博”之荐。尚在关中的他,东出“嵩少”,西游“晋中”,深恐“块处关中,必为当局所招致而受其笼络”,于是“不得不以逆旅为家”^{[14][P79]}。他甚至拟“寻乡村寺院,潜踪一两月”,然后寄希望于鼎贵之甥寻“调停之法”^{[14][P207]}。顾炎武还致信荐主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托为沮止”^{[14][P198]},并严气正性地申明“故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14][P53]}

面对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高压政策,顾炎武体现了艰难处境下的斗争策略。“毁我衣冠”,事关历史文化的继承乃至夷夏之防的重大问题,在明清之际显得空前严重^①。汉族民众尤其是知识精英纷纷揭竿裂裳,起而相抗;失败之后,虽满心不甘,亦无如之何,“大家只好投水的投水,上吊的上吊,为僧的为僧去了”^{[35][P26]}。在此情势下,顾炎武认为,剃发易服只是小节,而明道救世则关乎大义。因此,他主张存有有用之身以明道救世,反对为了“小节”“小信”而作无谓的牺牲。他说“天下之事,有杀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无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圣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于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来之谢,而古人不以为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节,他日事变之来,不能尽如吾料,苟执一不移,则为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于通人矣。”^{[14][P82]}基于这种认识,顾炎武在坚持“拒剃”5年之久后,毅然剃发易服。其诗曰“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14][P294]}顾炎武的这种“爱身”之性^②,既是对“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儒家精神的继承,也是其“以自私自利为本质特征的市民意识”^{[3][P45]}的表征。

^①戴名世指出,鼎革之际,明之士民死亡相望于道,“又多以不剃发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戴名世《戴名世集》卷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1页)

^②顾炎武指出“夫人生一世,所怀者六亲也,所爱者身也,……”(顾炎武《答再从兄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同为遗民,顾炎武识见过人之之处在于,他全无杜门晦迹乃至“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饷”^{[35] [P411]}等遗民自我锢闭的一般行为方式,而是广为接世,增长见识。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顾炎武认为,这种积极的姿态,更有利于个人的自我成就。“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14] [P90]}正因顾炎武的广师增益,才成就了他在历史上的通儒地位。

此外,顾炎武还广为结交清廷官员^①。“不消说遗民人物,就是其他一般平民甚至官员,也未见得会结交如此之多的包括上层高官和地方长官在内的各级官员。”^{[27] [P179]}在议论之苛的遗民社会,此举并未引起讥议^②。关于顾炎武与清廷官员交往的目的,有的学者指出“一是出于营生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来保障自己的人生安全和助成其谋生之需。”“二是出于自学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朋友们为他提供的比较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其他有利条件助成其学问。”^{[27] [P180-181]}笔者以为,顾炎武此举还有救世的目的。顾炎武的“无仕二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救民的方式、效力。作为无官守的一介学者,顾炎武自然不能直接动用行政资源来“救民以事”,他只能以间接手段“救民以言”^③。虽然顾炎武与这些清廷官员有出处上的不同选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拥有共同的话语系统——这是顾炎武与其保持友好关系进而实现“救民以言”的津梁^④。

在遗民立场上,顾炎武坚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统一。如果说“无仕二姓”,是顾炎武的有所不为,那么,他的广为交接以“明道救世”,则是他的有所为。随着“四海竟论胥”^{[14] [P426]},遗民中的一些顽梗者仍不愿放弃“恢复”的希望。顾炎武则“脱出遗民眼界”,“走出狭窄的道德氛围”,由切近的“待恢复”到相对渺远而抽象的“待后王”^{[17] [P317-318]},关

注的目标由“亡国”转向“亡天下”。一方面,顾炎武秉承儒者的使命,关心民生利病,救民于水火,“百姓之病,亦儒者所难忘”^{[14] [P190]};另一方面,他抱持着守先待后的信念,导引遗民学术以经世致用为指归,以音韵为治学的根本,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历算、天文、舆地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对清代学术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这正如梁启超指出“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17] [P58]}

参考文献:

- [1]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3] 杨国荣. 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J]. 哲学研究, 1993(6).
- [4] 杨国荣. 儒家视阈中的人格理想[J]. 道德与文明, 2012(5).
- [5] 胡发贵. 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论明末清初的精神状态[J]. 船山学刊, 2000(3).
- [6] 赵园. 明清之际士人的豪杰向慕与理想人格追寻——以易堂诸子为例[J]. 甘肃社会科学, 2004(6).
- [7] 李瑄. 豪杰: 遗民群体的人格理想[J]. 浙江学刊, 2007(5).
- [8] 朱汉民.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J]. 船山学刊, 2013(4).
- [9] 颜元. 颜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0] 许苏民. 顾炎武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许苏民. 祛魅·立人·改制——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三大主题[J]. 天津社会科学, 2007(2).
- [12] 李建中. 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J]. 社会科学战线, 1998(2).
- [13] 唐君毅. 孔子与人格世界[M]. 香港: 人文出版社, 1950.
- [14]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5] 黄云眉. 鮑琦亭文集选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16] 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①周可真对顾炎武与清廷官员的交往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爱国篇”第一章之第三节“遗民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85页)

②在三大儒中,王夫之立身最严,自不必论;黄宗羲因与清朝官员的交往而被贴上了“晚节多可议”的标签;顾炎武基本上没有受到讥议,恐怕主要是因为他拒绝出仕清廷的决绝立场广为人知,这种“大节”掩盖了“小节”出入。

③顾炎武指出,对于社会民生,无论是穷者,还是达者,都不能置身事外。“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顾炎武《日知录》卷13“直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4页。)

④这些官员大体上是儒学基本精神的践行者、继承者,或有专攻,或廉洁自守,刚正不阿,或尊师重道。因此,顾炎武的一些救世主张,或通过这官员直接解决,或借助这些官员上达庙堂,或以舆论的形式流播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思想资源。

- [17]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18]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9]陈友乔. 顾炎武北游期间的经济生活[J]. 兰州学刊, 2009(7).
- [20]全祖望. 鮑琦亭文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21]顾炎武. 日知录: 卷13[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2]周可真. 顾炎武年谱[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 [23]陈祖武. 顾炎武评传[M].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 [24]杜维明.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25]陈友乔. 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2).
- [26]归庄. 归庄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7]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
- [28]罗俊义. “黄宗羲现象”与《明夷待访录》——兼政治遗民、文化遗民与夷夏之辨大义论略[J]. 传统中国研究辑刊, 2005(1).
- [29]吕思勉. 中华史记: 下[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4.
- [30]王弘撰. 山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31]杜维运. 清代史学与史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2]全祖望. 鮑琦亭集: 卷2[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3]黎靖德. 朱子语类: 卷37[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34]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 [35]赵俪生. 顾亭林与王山史[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
- [36]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第10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Research on Gu Yanwu's Hero Personality

CHEN You - qiao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Law,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China)

Abstract: Hero personality was very popular among the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Gu Yanwu, who wanted him to be a hero and called for more heroes, wa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list of heroes. His hero personality aimed at comprehending the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and saving disordered society for its personality structure with original Confucianism as the base and with the new conception of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Under his thought, Gu Yanwu's independence on his study as well as his personality objected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d of Lu Jiuyuan and Wang Yangming. He tried to reveal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to the governors by his words and his works.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depravation by Wang Yangming, he represented his great power to fight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and pave a new way.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he resolutely insist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and emphasis on adaptation, which opened up a new land for the cause of adherents.

Key words: Gu Yanwu; hero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salv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ambition to pave new way; 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and emphasis on adaptation

(责任编辑 王能昌)